

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 纪念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编辑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 纪念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

《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编辑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
纪念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

《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编辑组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插页: 4 字数: 193千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303-01006-8/K·28

定 价: 5.50 元



黎锦熙 像



黎錦熙先生主要著作

學問淵博，著述等身。作育
為懷，會友以文。考証訓詁，
尤其餘事。改革以字，獨建
殊功。一九八六年冬，十月廿五，怀念

黎錦熙先生。

周谷城于北京。

前 言

黎锦熙先生字劭西，湖南湘潭县人，1890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湘潭，1978年3月27日逝世于首都北京。

先生是著名的语法学家，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是白话文语法的代表作，系统而完整，提出了“句本位”新体系，堪称为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著作，影响巨大。其后又著有《比较文法》、《现代汉语语法教材》等书。

先生是著名的词典编纂家，曾主持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工作，培养了不少精熟的编辑人员。《中国大辞典》碍于时局变化虽未能成书，但积存卡片二百余万张，是珍贵的资料。先生发表的几种训诂学方面的单篇释词论文，即所谓辞典“长编”，都是为撰写大辞典的辞条做准备的。中国大辞典处后来出版的《国语辞典》、《增注中华新韵》以及《学文化辞典》、《同音辞典》、《汉语辞典》等，其体例、注音与先生的设计、指导密切相关。

先生是著名的推行“国语”的先驱，曾倡导组织国语研究会，长期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与赵元任、钱玄同确定北京话为国语标准音。先生提出“词类连书”（词语连写）的主张并力倡铸造“注音汉字”铜模，这些都是独特的贡献。在这方面先生著有《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国语运动史纲》、《注音汉字》等书。

先生是著名的文字改革家，先生与赵元任、钱玄同、刘复、汪怡、林语堂等组织“数人会”议定国语罗马字，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由大学院公布。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建国后，先生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的前身)常务理事会副主任、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著有《国语新文字论》。后来又与吴玉章合写了长篇论文《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字母的总结》。

先生是教育家,年轻时即在湖南长沙做师范学校教师,与毛泽东同志等关系较深。后来北京,起初任教育部教科书特邀编纂员。1920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至逝世。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曾任文学院院长、中文系系主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抗战期间,曾随师大西迁陕甘。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

先生是政治活动家。1945年参加“民主科学社”。“民主科学社”当年改名为“九三学社”,先生任九三学社监事,后来一直任常务理事。先生是第一、二、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黎锦熙先生是国际知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著述丰富,除语言文字学著述外,还有《方志今议》、《劭西诗存》等行世。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生的学术成就、工作业绩久为世人所敬仰,兹值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特编纪念文集以志各界人士对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编辑纪念文集过程中,承黎先生的生前友好、几代学生惠赐鸿文,谨致谢意。并感谢启功先生题写书签和师大校友会、师大出版社在出版文集方面给予的协助。具体编辑工作由曹述敬、史锡尧二人承担。

北京师范大学《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编辑组

1989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黎锦熙教授与九三学社	袁翰青 (1)
回忆黎劭西先生	钟敬文 (4)
语文现代化的先驱和导师	
(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周有光 (8)
追忆往事	
纪念黎劭西先生	俞 敏 (12)
怀念伟大的语言学大师黎锦熙先生	
——纪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殷焕先 (16)
劭老二三事	杨伯峻 (22)
怀念黎锦熙先生	葛信益 (24)
缅怀黎老	高景成 (27)
黎锦熙与齐白石	李源汉 (30)
黎锦熙先生热心家乡教育事业	周家乾 (33)
毛传的几个互训问题	肖 璋 (35)
科学研究近代俗语的先驱	
——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许嘉璐 (40)
黎锦熙先生对词书编纂工作的贡献	孙崇义 (50)
黎锦熙先生“词类连书”的卓识远见	徐世荣 (54)
汉语音韵中的字音和字调	
——为纪念黎劭西师诞生一百周年作	张拱贵 (59)
论句本位语法	廖序东 (69)

句的分类问题

- 黎锦熙老师一百周年诞辰纪念……………贾则复(84)
- 读《新著国语文法》札记……………张寿康(91)
- 《新著国语文法》的历史贡献……………史锡尧(98)
- 我国现代语文教学法的先驱——黎锦熙先生……………张鸿苓(105)
- 从《新著国语文法》到《新国文教学法》

——简论黎锦熙先生对语文教学法学科的贡献…张 锐(113)

读《修辞学比兴篇》

——纪念黎锦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张寿康(129)

黎锦熙先生的学术贡献……………徐世荣(136)

忆黎锦熙老师……………张清常(148)

在向劭西师请教的日子里……………吴奔星(152)

建议尽快全面整理《黎锦熙日记》……………顾学颀(160)

怀念黎锦熙老师……………陈 侠(164)

纪念黎锦熙先生……………古德夫(167)

仰之弥高

——深切怀念黎劭西老师……………曹述敬(172)

深切的怀念，永久的遗憾……………黎 靖(201)

怀念我的老师黎锦熙先生……………孙毓贻(203)

缅怀黎锦熙先生……………李少明(209)

黎锦熙先生在我心中……………杨占升(221)

黎锦熙教授十年祭……………李振生(224)

先师黎锦熙先生著作目录系年……………曹述敬(227)

黎锦熙教授与九三学社

袁翰青

黎锦熙字劭西，于1890年2月2日诞生在湖南湘潭，到1990年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他在1978年3月27日谢世，享年87岁。他一生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近70年。他所研究和探讨的领域相当广博：在语音、音韵、语法、修辞、汉语史、辞典编纂和文字改革与推广普通话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这些方面已有很多人介绍和研究。

这里，我只想谈一谈黎老和九三学社的关系。

九三学社本来叫“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来由于孙科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了一个刊物叫《民主与科学》，许老等人唯恐外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名字就暂时不用了，但是大家还经常在一起座谈。日寇正式投降日子是9月3日，于是改名“九三学社”。据涂长望同志告诉我，“九三学社”这四个字是他首先提出的。当时的社员只有127人。

黎老和我都是在兰州参加“九三”的。那时是1945年上半年。黄国璋同志被西北师范学院借聘到兰州讲课，我也在该学院兼课，黎老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我常常从黎老的家门口过，见到他冬季一面晒太阳，一面读书。他家的大门口挂一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牌子。这时，我一定举手同他打招呼。一次黄教授和我到黎老家，黄教授希望黎老和我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我们两人都表示同意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更改名字的时候，黎老在兰州还是被公推为“九三”的监事。

1949年7月里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同志邀我去北京饭店一间当时统战部专用的房间里，他提出，九三学社应该作为一个党派参加全国政协。他说，毛主席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黎老正在那里教历史课。由于我们知道黎老已参加了九三学社，所以我们希望把九三学社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据齐讲黎老已同意了，而许老因为先已作为民主教授的身份准备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所以有些踌躇。他劝我去说服许老同意这个建议。后来我找到许老，一再讲了党中央的看法，他终于同意了。

在此之前，周总理于这年6月16日在“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解释报告”里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情况不同了，本来23个单位已经协商很久了，考虑到邀请他们，象刚才说的两个团体——九三学社、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物，如九三学社的许德珩先生等也都参加了其他单位，这两个单位在筹备会议中就不再邀请了，留待正式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再邀请。这当然还要同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当时协商，九三学社是打算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而民主革命同盟这个组织本身也打算改建为团体。”不久，民主革命同盟就宣布解散了。九三学社没有解散，可以说与黎老有很大关系。

就在这个期间，和平门内早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尚志学会会所，被北京师范大学租用为教授宿舍，毛主席和当时住在那里的汤璪真教授曾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所以毛主席特别去那里看望汤教授。汤在会见时提起黎老。毛主席就特别派车去接黎老。同时派人到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酒席，在汤家设宴，并请了住在宿舍中的傅仲嘉、董渭川等教授。黎老在席间谈起1915年到1920年间，毛主席曾写过六封信给他，他至今保存着，并谈起他早参加了九三学社。由于黎老这段话，毛主席对九三学社有了较深的印象。后来中央统战部考虑把九三作为民主党派，请许老改

作九三学社负责人。

大概是这个前因，才有了后来齐燕铭同志在北京饭店专门找我谈话之事。

可见，九三学社成为民主党派，这与黎老有相当大的关系。

今天，九三学社发展社员近三万余人，队伍如此壮大，前人是无法想到的。我想，九三如此发展，一方面靠老一辈社员的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跟黎老以及社会的发展不可分离。

1950年黎老被任命为吴玉章领导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目前的文字改革和拼音方案，都和黎老有很大关系，他尽了相当大的力量。

第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之后，沈钧儒同志特别来府学胡同北大宿舍看望许老，希望许老同意把九三学社归并于民主同盟。后来我们请示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他表示了不同意。他说：“九三学社，都是一批拿粉笔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特别举了黎老为例，因此，九三学社就单独发展起来了。

以上我所写的许多事实，都有很多文献可以作为参考。例如《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73页上，就有毛泽东主席写给黎老的信。

黎老一生曾担任九三学社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央常委。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来，黎老的后半生和九三学社的关系，是紧密的。

回忆黎劭西先生

钟敬文

今年春间，我在写作一篇纪念“五四”学术活动的论文（题目：《“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是准备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五四”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因为论文里涉及当时的统一国语和言、文一致等问题，我重新披阅了黎先生的力作《国语运动史纲》。

这部刊行于半个世纪以前的（1934）、四百余页的学术史著作，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资料翔实而丰富。黎先生是我国国语运动热心的提倡者和参与者。许多事情和有关资料，是他的亲身经历或参与制作的。他又是那些资料（包括事件记录）劬勤的辑录者和保存者。好象他一开始参加这项工作，就存心准备写作这样一部学术史似的。它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多少方便！我就是在这点上从心底感谢他的。

如果一部学术史著作，它的长处只在于资料的丰赡和可靠，还不能就算是最好著作。写作这种著作，须要有比较高明的见解，就是过去学者们所强调的“史识”。在这点上，黎先生也是没有愧色的。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当行的语言学家、国语学家，而且也具有时代的民主思想和推进民智的用世热忱。加以文字表达上的清晰条理和优雅诙谐，这就自然要使我们读者得到好处和感到愉快了。

在这段时期里，我还读了黎先生那篇冠在《重印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之前的《代序》（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书）。这篇

二十八页的长序，同样使我读了感到愉快。因为它不但给与以我有关的知识，也使我了解到黎先生在文学史方面的学养和见解，体味到他鼓吹白话文学的热情。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这位已故的前辈，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因而也更加怀念起他来。

我跟黎先生相识和共事，虽然是在全国解放初期，但是，知道他的名字以及诵读他的著作，却远在20年代中期。记得他那部在学界很有影响的《新著国语文法》，我不仅读过了，并且曾经用它去教过学生。我仅有的一些关于国语文法的知识，主要还是从它那里得来的。我后来离开广东，在杭州等地工作，又陆续读过些他关于语文改革、罗马字拼音及修辞学等论著。尽管严格地说，我们不算同行，但他无疑是我敬重的一位学界前辈。

1949年夏天，我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后，有些广东的同志希望我跟他们一道随军南下。我因为要在北京创立研究民间文艺的机构（该机构于次年春成立，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所以没有成行。不久，我新认识了叶丁易同志，他是一位进步的年轻的学者和作家，曾经去过解放区，这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为了想使该系增添一些新的力量吧，约我和黄药眠同志到该系共同工作。我们答应了。当时黎先生任北师大校委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他约我和药眠面谈。地点是西单西头的“大地”（俄国式餐厅）。丁易同志当然也在座。黎先生初次给我的印象是：身材短小，面庞瘦削而微黑，但双眼奕奕有神。他的说话略带湘音，使我联想起另一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满口流利的京音来。黎先生对药眠和我约略提到授课的科目和时数，显出他是一个富有行政经验的、精干的学者。

他约我开设民间文学课是很自然的，他在《国语运动史纲》的长篇序言中已提到我重编过清李调元的《粤风》。在这次餐桌上的

谈话里，有一件事当时很使我感到诧异。那就是要我开设“方言调查课”问题。当时，黎先生谈到我将来所授的科目，他希望我开设一门“方言调查”之类的功课。我当然谢绝了。他也没有勉强我。但是，我心里总不免觉得怪异。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希望中文系里有较多的同事来开语言学方面的功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一向是搞文学的，特别是搞民间文学的。历年所发表的文章，除了文学和民俗学外，也很少涉及其它学科。这点，他大体是应该知道的（即使我自己或丁易同志没有作过介绍）。为什么他老先生竟提出那样的希望呢？原因到底在哪里？经过心里反复思考，我忽然领悟过来了。

事情的来源大概是这样的。本世纪20年代中期，我常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发表关于民间文学一类的文章。有一次，在《歌谣》上看到毛坤先生所译的P·马伦笃夫《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该刊89号，“方言研究号”，1925.5）的论文，我觉得文中关于我国地理及方言分布的话，跟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形有出入，便写信给译者，指出错误的地方。译者写了同意我的指摘的回信，并把它跟我的原信，用《关于中国方言之分类的讨论》的题名，一齐发表于《国学门周刊》第六期。当时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它的出版物，较早的如《新潮》，稍后的如《国学季刊》以及《歌谣》周刊、《国学门周刊》等，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黎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虽然他致力的是语言方面），并且住在北京，当然是看到我和毛坤同志讨论方言的信的。因此，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所以在二十多年后请我在他主持的中文系里教书时，便想了起来，并希望我为系里开设这类的课目。

从上面的叙述看，这无疑是一场误会。但是，它是何等值得思索，乃至至于何等值得感谢的误会！二十多年前，一个刊物上所登载的通信，黎先生竟铭记在心，历久不忘。这岂仅仅是记性过人